

JIDIAN YU BOXING

积淀与勃兴

当代大学生全面发展战略架构

DANGDAI DAXUESHENG
QUANMIAN FAZHAN
ZHANLUE JIAGOU

姚秋杰 许长盛 黄永久 / 主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积淀与勃兴



主 编 姚秋杰 许长盛 黄永久

吉林大学出版社

出版系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积淀与勃兴——当代大学生全面发展战略架构

主 编：姚秋杰 许长盛 黄永久 责任编辑：王炳顺

封面设计：杨 静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国·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印 刷：北京市朝教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8.75 字 数：22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7-206-02994-9/G · 795

版 次：2005 年 7 月第 2 版 印 次：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 000 册 定 价：21.9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前　　言

21世纪正向我们走来……

我们正向21世纪走去……

百年更迭，千年交替，人类正大步跨越这一新世纪的门槛，正在迎接这一千年期的际遇。

21世纪是一个崭新的时间概念，

因为它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21世纪是一个深邃的哲学命题，

因为它包容了太多太多的涵义；

21世纪是一个陌生的世纪，

因为人类需要太多太多的破译。

恰是在这样一种形势下，素质教育以一个全新的面貌走向历史的前台。

无疑，科教兴国，教育当此重任即必须彻底变革自身，其中包括：重新审视教育的发展目标，重新调整教育的全部内容，重新调整教育的对象层次，重新整合教育的基本功能，重新调适教育的运作程序，等等。由此构成一个全新的教育理念，以内涵更加丰富、外延更为广阔、概念更为科学的素质教育取代或逐渐取代总体意义上的应试教育，进而向全面发展教育迈进。

进行素质教育的全面构建，探讨素质教育的实际运作，已在基础教育领域取得了喜人的成绩；但在高教战线，素质教育

2 积淀与勃兴——当代大学生全面发展战略架构

尚处酝酿之中、讨论之中、尝试之中，而日益迫近的21世纪与突飞猛进的现代化事业则要求教育作出迅速的反应、实质的变革与大步的跨越。因此，出于一种跨越世纪的冲动，一种憧憬未来的期盼，一种钟爱教育的热诚，我们大胆而急切、粗糙而概略地勾画了本书——《当代大（中专）学生全面发展战略架构》。试图通过这一初步而不成熟的构想，参与教育思想、教育观念变革的热烈讨论，并奉献我们刚刚抒出的一点思考。

目 录

上 篇 暮色苍苍—应试教育隐隐消遁

第一章 应试教育——寻踪与回眸	(1)
一、古代应试教育寻踪	(1)
二、近代应试教育回眸	(9)
三、现代应试教育反顾	(21)
第二章 宏观远眺——应试与应势	(30)
一、应试教育何以面对人才险情困扰	(30)
二、应试教育何以迎接技术革命挑战	(41)
三、应试教育何以面对综合国力较量	(52)
第三章 微观考察——穷途与更张	(62)
一、应试教育已近穷途	(62)
二、应试教育亟待更张	(72)
三、素质教育尚待自圆	(82)

中 篇 乱云飞渡—素质教育喷薄欲出

第四章 素质教育——一个全新的理念	(92)
一、理念定位:时代的呼唤	(92)
二、目标阐释:历史的前提	(104)
三、框架建构:理念的标记	(108)

第五章 素质教育——一套全新的内涵	(112)
一、首位要素：人文精神的张扬	(112)
二、基本构件：文化学识的积淀	(128)
三、基础前提：身心素质的培养	(143)
第六章 素质教育——一个全新的模式	(156)
一、观念变革：素质教育的开启	(156)
二、步骤调适：素质教育的韵律	(164)
三、方法释义：素质教育的践履	(177)

下 篇 壮丽复出——时代英才如日中天

第七章 智力本位——素质教育之源	(188)
一、智力本位的历史考察	(188)
二、智力本位的价值意义	(198)
三、智力本位的现代合成	(203)
第八章 能力本位——素质教育之流	(216)
一、能力本位的历史发展	(216)
二、能力本位的价值取向	(225)
三、能力结构的现代诠释	(232)
第九章 人格模塑——素质教育之魂	(243)
一、人格模式的历史趋势	(243)
二、人格模式的现代价值	(257)
三、人格模式的中国特色	(263)
后 记	(273)

上 篇

暮色苍苍—应试教育隐隐消遁

第一章 应试教育——寻踪与回眸

一、古代应试教育寻踪

可以说，中国古代是应试教育表现最为充分的历史时期。封建统治阶级为了选拔人才，采取了一套非常严密的“取士”制度，这就是“科举考试”。

科举制度，始建于隋朝。在此之前，选拔人才不经过考试，靠的是推荐。《史记》有载，上古圣明君主尧曾以推荐考察方法选拔接班人。他听族长们说，舜是个德才兼备的人，就把两个女儿嫁给舜，让他们观察舜的德性。经过三年的考察，果然发现舜仁孝礼顺，治家有方，尧便把君位传给了舜。舜继位后又用同样方法选择禹为自己的接班人，这就是古时留传的“禅让制”。

西周时期，人才选拔开始走向制度化。除大夫以上的官员

由贵族世袭外，其他的则采取“乡举里选”的办法广纳人才。乡、里都是当时的地方行政组织，乡里选出有才能的“秀士”，由诸侯贡献给天子，叫“贡士”。周天子亲自对贡士进行考试，选拔优秀者担任朝廷命官。春秋战国以前，学在官府，入学者皆为贵族子弟。

春秋战国时期，正是用人之际，贵族世袭制逐渐被摒弃，推荐人才担任高级幕僚成为诸侯们增强竞争实力的重要举措，举荐制应运而生。

到了汉代，中央太学招收博士弟子，经常需要考试加以甄别，使汉代太学颇具贫民特色。汉武帝时期，“按郡国察举”成为一项严密的制度，在位丞相、列侯、刺史、守、相等，定期需向朝廷推举贤能，察举科目有孝廉、贤良、文学、秀才等。通过后，由乡、里评议，郡国考察、推举到朝廷。朝廷再进行一定的考试，当时采用“策问”形式。这种形式为后来科举制所采纳。“乡举里选”制度发展到后期渐重门阀，失去地方清议的作用。汉末三国鼎立，战乱频仍，雄杰并起，曹操求贤心切，力主“术兼名法”、“惟才是举”，七年间连发三道求贤令。黄初元年（公元 220 年），曹丕继位，沿用曹操用人之法并进一步扩展为九品中正制。即在中央选拔“贤有识鉴”的官员，兼任本郡“中正”，负责察访散在各地的士人。“中正”根据家世、才德将辖区人列为九品，上报朝廷，朝廷按品级委任官职。

应当指出的是，“九品中正制”前期确实起到了惟才是举的作用，但到了后期则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变成只看门第，不分贤愚，即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高官显要皆为豪族所垄断，这在一定程度上又降低了士族的质量。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子学的出现取代了太学的最高学府地位，而所谓

“国子学”即招收高官子弟，当然不会面向平民。

隋文帝后，废除了九品中正制，采取分科举士法选拔人才。科举一词即设科目考试选举人才之意。从此考试作为衡量人才主要标准的观念被确立起来。科举制度经过唐代的发展到宋明而定型，一直沿用到清末。

(一) 科举考试程式

科举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为选拔人才而实行的一种制度。

隋王朝时期士族已失去了政治上的垄断地位，庶族地主的势力发展到要求参政的程度，这样以门第取才的“九品中正”制度自然失去功用。隋朝统治者顺势废除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制。在地方设立州县学，其生徒可“升进于朝进行考试”。^①

科举制在唐太宗、唐高宗年间为极盛时期，在此时期逐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考试制度。唐代科举常年定期考试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另外还有非常科，如三礼、三传、道举、童子科等。

考取进士后要经吏部考试才能任官。唐代中央太学等级森严，平民俊士子弟只能考取四门学及律书、算学而不可能问津国子学与太学。

宋代科举大体承袭了唐代形式，但增加了由皇帝主持的殿试，形成了州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试的格局，考试的组织逐渐完善严密。殿试成绩分为五等。第一、二等称为赐同进士及第（一甲），第三等称为赐进士出身（二甲），第四、五等称为赐同进士出身（三甲）。宋代科举考试时间不等，但扩大了各科的名额，中央官学一般皆可招考平民俊秀，同时还提高了及

^① 《通典》卷一七，卷一八，《选举典》。

第后的待遇。

清朝，科举制已相当完善，科考分为四级：第一级为科试，称应试者为童生，经县试、府试、院试及格者为秀才；第二级为乡试，乡试在省举行，凡属于本省的府、州、厅、县生员与贡监生均可应试，及第者为举人，第一名称“解元”；第三级为会试，在京师礼部应试，及第者称贡生，第一名称“会元”；第四级为殿试，由天子主持，及第者称进士。进士一甲三元，依次为状元、榜眼、探花。

（二）具体考试内容

科考内容向以儒家经典为主。先是5科，后增至9种，再后增至13种，因而历史上有五经、九经、十三经之说。这13种书分别是：《诗经》、《尚书》、《易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春秋左氏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由于此等书籍在流传中不断有人为其作注，因此到了唐代，各种经典解说令学者眼花缭乱，导致诸多学术之争，科举考试也很难有一致的标准，为此唐太宗令大学者孔颖达组织学术精深之人进行整理，编成《五经正义》180卷，作为官定的权威解释，并以此作为科举考试之范本。

科举考试科目根据各种所习专业内容不同而各有侧重。

秀才科课重经义。分为五经、三经、二经学究一经。三礼、三传各试所习业，文注精熟，辨明义理，然后为通。正经有五种，分为大经、中经、小经三类。《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谷梁》为小经。通二经指通一大一小或通两中经；通三经的，须通大小各一经；通五经的，大经并通，《孝经》和

《论语》为共同必试。

明经科考试内容多有变化。上元二年（公元 675 年），诏明经皆试《老子》第三条。仪凤三年敕自后将《道德经》、《孝经》并为上经，贡举皆须兼通。以后又对《道德经》考试屡停屡复。武则天自制《臣轨》，曾一度代替《道德经》，作为贡举人必习之书，《尔雅》亦较长期地取代《道德经》在考试中的地位。贞元年间曾一度用“法律”代替《道德经》，从明经科考目的变更中反映出历代统治者对儒学和道教的不同态度。

进士科注重诗赋。进士考试包括帖经、试杂文、时务策三场。先是帖一小经及《老子》，后改帖一大经，再后来改《老子》为《尔雅》；试杂文两首（诗赋各一篇）。须“洞悉文律”；策时务五条“义理慨当”为通，若“事义有滞，词句不伦”为下。经策全通者为甲，策通四、帖过四以上为乙，以下为不及第。到唐朝后期进士科考试偏重诗赋，有人说唐诗之盛全由进士科提倡诗赋所致，此话不无道理。

进士踏入仕途往往担任朝廷文职，接触上层统治者，因此也容易受到皇帝的恩宠。进士科一般采用人数极少，唐朝 289 年总共录取进士 6300 余人，平均每年 20 余人，对于一个泱泱大国，可谓凤毛麟角，因此能得此殊荣之人被称为“跳龙门”。这个典故出自古书《三秦记》。书中记载，每年春天，下游各流域的鲤鱼都聚于陕西韩城县黄河“龙门”水道上，它们腾跃而上，跳上去了就变成了“龙”，但能跃过高悬险绝龙门的据说每年只有 72 条，故称得上万里挑一。后来人们把科举考试进士中第之人称为“登龙门”。考试之艰难可想而知，但中第后之荣耀自得更是士子们所翘首企盼的。

童子科，在科举考试中常有一些早慧的少年参预其中。唐

代规定，凡 10 岁以下，能通晓一种儒家经典，就给予进士出身。童子科的出现，无疑对社会是一种刺激，揠苗助长的事也就随之而来。据宋元英《文昌杂录》记载，宋神宗 7 年（公元 1075 年）4 月，江西饶州 11 岁的神童朱天锡应童子试就通晓五经，皇帝赐进士出身，赏钱 5 万。同年 10 月，其堂兄，12 岁的朱天甲又到礼部应试，超过朱天锡，会背 10 种经典，皇帝赐予进士出身。从此，二朱家乡饶州乡争相效仿，不管儿子有没有天赋，只要教会几个字便从五六岁起让他们背五经，虽然后来饶州儿童也有中第之人，但被逼死的孩子要比中第的孩子多得多。

（三）科举考试方法

科考方法有口试、帖经、墨义、策问、诗赋、八股文等。

口试，顾名思义是考官将试题以口述或题签的方式告与考生，考生以口对答的方式进行考试。

帖经就是将书任揭一页，把上下两边蒙着，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应试者填起来。唐代考帖经一次出 10 题，答对 6 题才算及格。考官为难住考生，专找“孤章绝句，疑似参互之处”，以迷惑试者。

墨义则类似今天的问答。考官列出某经典的正文，考生按官定注本的说法进行解释。一种经典也是试 10 题，答对 6 题即为及格。墨义要求考生对经文的字词作正确的理解，懂得行文意思，这比起帖经来难度更大些。

策问。“策”是用竹简把考题写于其上，让应试者回答，也叫“对策”，此种方法起源于汉代。

诗赋是古代科考的重要文体，亦称格律诗和骈赋。赋，讲求铺张排比，形成于汉代，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开始求对偶

和声音的和谐，更注重词采的华丽。格律诗形成于唐代，讲究平仄和押韵。无论诗赋，都具有极高的形式美，很能体现一个人的文学才能。以诗赋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是唐代的鲜明特色。以诗赋取士，固然可以考查文学才能，但国家选拔人才并不全要吟诗作赋之人，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它的弊端也日渐显露。宋代王安石倡导改革，取消了以诗赋为主要录取标准的成规。

八股取士始于明朝。股是对偶之意。八股文就是用对偶来作文章，这是一种严格注重格式的文体。采取八股文取士之后，学校教育的重心就以训练学生读八股文，作八股文，不学史书、算学、天文等自然科学知识，甚至连经书也被束之高阁。八股文控制科举考试达 500 年之久，直到清末，随着科举考试的废除才销声匿迹。

（四）报考办法

考生分“生徒”、“乡贡”两种。每年州县馆监可举选学业已成的学生（生徒）送至尚书省；“乡贡”则由各人自己怀牒向州县报考，试毕送至尚书省。无论“生徒”或“乡贡”，送至尚书省报到后，具保结，由户部集阅后送考功员外郎试之。考试时间在秋季，所以人们称之为“秋闱”。参加乡试的叫童生（童生即参加县学的录取考试，凡是沒有取得县学（府学）资格的人统称童生，乡试及格称为举人，中了举，才能取得会试的通行证，才算是真正踏上了仕途）。

在中国古代名著《儒林外史》中有个“范进中举”的故事。范进是个热衷于功名的穷书生，连考 20 余次，在“天命”之年还是个童生。考官可怜他年迈，舍给他个秀才。为获举人的头衔，范进四处奔波凑借应考所需银两，他找到老丈人胡屠

户，被骂个狗血喷头，无奈只好瞒着家人，偷偷应考。谁知这次竟然榜上有名，中了举人，听到消息后，他因过度兴奋发了疯，拍手喊着“我中了”，“我中了”，四处乱跑，后来在胡屠户打了他一记耳光之后方才清醒。自从范进走了官运，远近乡绅都来拜见，老丈人也对他变得毕恭毕敬了。这个耳熟能详的故事充分说明了科举制度的残酷和人们追逐它的功利目的。

科举考试对报考资格审察十分严格。科举考试要求考生家庭出身一定要“清白”。怎样才叫清白呢？唐朝规定，犯法的人、工商业者、州县衙门的役吏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宋代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不孝不悌者、和尚道士归俗者，如有“缺孝悌之行、资朋党之势，迹由邪经，言涉多端”者不得就试。清代规定更严格，凡是娼（妓女）、优（演员）、隶（下等役吏）、卒（劳役）的子孙都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另外，佣人、看门人、轿夫、媒婆、剃头修脚者也属“身世不清”之人，他们的子孙亦在排斥之列。

省试及第后还需吏部考试，及格后才能授予官职。吏部考试包括四个方面：身、言、书、判。身指体貌，言指言辞。体貌要求五官端正，身体丰伟；言辞要求口齿清楚，条理分明。书指书法，判指判案的文词。书法要求楷书工整漂亮；判词要求文理通达。

古代科考有专门的考场，叫贡院。贡院四周高墙上插满棘刺，考试期间派军队把守，考生入考场需自带水炭餐具食料，具保结，搜索衣物后入场。场内兵卫森严，号舍短屋，颇令士子难堪。浙江《乡闱诗刊》有云：“负凳提篮浑似丐，过堂喝号直如囚”。有的考生因没备茶水，渴急了，只好喝砚台里准备磨墨的水，常常弄得嘴唇乌黑。真是“三场辛苦魔成鬼，两句

功名误煞人”。

到了清朝，科举制已走向没路，清王朝为了确保其欲坠江山。大兴“文字狱”。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个皇帝多次屠戮士子。康熙初年“明史案”，即是一件极典型的文字狱案件。庄廷珑得明大学士朱国桢所著《明史稿》，增改刊印，定名《明书》。书中表现一些思念明朝，反对清朝的民族意识，经人告发，清廷遂兴大狱。当时庄廷珑已死，被剖棺戮尸，遗属均遭杀害。凡与此书有牵涉的，如作序人、校补人、刻印人，甚至卖书人、买书人都被处死，共杀70余人，充军发配的更不在少数。

尽管科举制这般残酷，繁缛，但古人仍不惜以悬头、锥刺及寒窗孤灯之苦去追逐书中的“黄金屋”、“颜如玉”，一旦考取功名、官袍加身则光宗耀祖，泽及子孙。正是在这一机制的刺激下，科举制才绵延千年而不绝。

二、近代应试教育回眸

“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基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① 马克思的这段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6页。

话正是对近代中国的注释。

中国近代史是由鸦片战争拉开序幕的。从 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外国侵略势力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中国古老的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几千年一以贯之的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随着这一社会形态的形成，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也发生了变化。除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之外，又加上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民族危机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疯狂侵略逐步加深，与此同时，也产生了资产阶级维新运动，人民民主革命运动。这一切都严重地打击了封建势力，破坏了封建统治秩序，其文化教育也受到严重冲击。

（一）清末教育的空疏腐化，科举制的终结

古代中国是一个封闭、稳定的封建社会结构。在大一统的皇权观念统治下，儒家道统一直处于主导地位，非儒家思想则一律被视为异端邪说，其思想文化乃至科举制度在近两千年的时间内基本处于统治地位，直到清朝光绪年间才给这个苍老的形式划上句号。

清朝，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它是在满族贵族征服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基础上建立的，带有明显民族统治特点的，满汉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权。

清朝开国后，满族贵族一方面用武力镇压其他民族的反抗，另一方面采用满汉复制和恢复加强封建土地所有制、恢复科举的办法，软化、拉拢汉族官僚、地主和知识分子。清朝在康熙、雍正、乾隆年间达到鼎盛时期。18 世纪末，清王朝由盛转衰，社会显现出衰败景象。在政治上，吏治腐败，统治集团奢侈，靡费；在经济上，土地兼并之风与日俱增，大量农民沦为佃户；